

反“左”的宣言书

——读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札记

陈德华

(南京晓庄学院 法政系, 江苏 南京 210017)

[摘要]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是既反右而主要是反“左”的宣言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反映。在南方谈话的文本中, 加快发展是主题,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是强调的重点, 既反右而主要是反“左”是关键所在。

[关键词] 邓小平; 南方谈话; 反“左”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 (2002) 02—0001—06

十年前,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 视察南方并发表了重要谈话。这个谈话, 精辟地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科学地总结了历史新时期党的伟大实践和基本经验, 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动摇不得”,^[1](P. 370-371)]提出“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1](P. 371)]的著名论断。今天, 重温谈话, 只有联系南方谈话发表的时代背景, 联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才能正确理解这个论断, 得出南方谈话是既反右而主要是反“左”的结论。

—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我国面对的国际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从总体上看, 和平与发展正成为时代的主题, 旧的世界格局已被打破, 新格局尚未形成。但是世界风云变幻, 天下很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 西方一些政治势力加紧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标志, 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多少年来, 西方国家总是企图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纳入资本主义轨道, 继前苏联之后, 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一直是他们搞“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这种国际的“大气候”, 直接酿成我国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尽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力挽狂澜, 但西方反华势力仍企图打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利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这严峻的国际形势必然会波及国内。依据历史的经验, 每当国际形势紧张, 压力异常巨大, 国内往往产生“左”倾倾向, 往往会采取“左”的或偏“左”的对策。新中国刚刚成立, 由于美国对

[收稿日期] 2002—03—03

[作者简介] 陈德华(1946—), 男, 上海市人, 南京晓庄学院法政系副教授。

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在政治上不承认我国政府，随后是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在这种情势下，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尽管有人向中央提议中国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可以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正厉兵秣马，准备打过长江去，国民党南京政府逃窜到广州，苏联驻华使馆随之南迁，而美国大使馆却留在南京不走。随后发生一系列的事情，据林孟熹著的《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披露：毛泽东和周恩来以无比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胆略纵横捭阖。先是因势利导亲邀司徒北上，其长远战略为化解中美对立，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其近期目的则在于增加手上之筹码，以应付即将举行的中苏谈判。其后邀请被拒，于是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事情抹得一干二净，仿佛世界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同时却朝着那只一向心怀叵测的北方大熊投去，高唱“一边倒”。^{[2](P.127)}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似乎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但在当时却是比较好的选择。1972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工作人员报告，题为《1949年及1950年的美国及共产党中国：关于恢复邦交和承认的问题》，由主席富布赖特撰写序言。该报告公正地指出：“在经过一段短暂的努力以寻求与美国恢复邦交之后（对此杜鲁门政府并未予以积极回响），党的领导人遂决定‘倒’到苏联一边而远离西方。”^{[2](P.129)}结果中苏结盟，中美交恶，朝鲜战争一起，形成中美直接军事对抗的态势。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长篇秘密报告，以“反对个人迷信”为名大反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同年6月和10月，波兰和匈牙利相继发生了严重的政治事件，史称“波匈事件”。从此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大动荡时期。1957年我党发动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就与此直接有关。当年的6月8日，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指示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3](P.35-36)}反右斗争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懂得经营管理的工商业者和各级机关干部。事实证明，反右斗争是在“左”倾思潮指导下造成了极不幸后果的政治运动。

1960年，苏共中央开始利用兄弟党代表大会的讲坛攻击中共，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逐步恶化。当年的7月16日，“苏共中央就通过苏联政府通知我国，将按照协定来华帮助建设或进行合作的苏联专家，立即全部撤走，并中止执行和片面撕毁了几百项协议、合同，又找岔子驱赶我国外交人员，在中苏边界上挑起纠纷，一时真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3](P.215)}对此，我党在国际上开展“反修”斗争，国内是“防修”。到1962年所谓“帝修反反华大合唱”时，在当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大讲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完全背离了党的“八大”确定的方针，此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期来临，到了1966年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在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会出现右的思潮，但为什么我们的对策往往不是右而是“左”的倾向？究其原因，至少有四条：一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就象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就容易产生“左”的片面性和极端化；二是政治上过分强调要站稳立场，坚持原则，划清界线，一致对敌，容易把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上纲上线”，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三是思想方法上的宁“左”勿右，错误地认为“左”是方法问题，还是要革命的，而右是原则问题，是不要革命甚至反对革命的问题，从而形成一种思

维定势；四是由于涉及国际关系，囿于地理、历史、人文等条件的限制，情况了解得不够全面或深入，判断产生失误。

二

严峻的国际形势对国内形势发生巨大的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风起云涌，波澜迭起。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十分明确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又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1](P.375)}

“动乱就是右的！”因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恶果。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思潮。就其核心的政治观点来看，是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其理论基础是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多元主义，其思想基础是西方的拜金主义和“自我中心论”的价值观。这三种思潮的相互结合，就使我们国内意识形态的斗争具有国际范围阶级斗争的性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高瞻远瞩，见微知著，首先提出并一再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阐明必须要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1](P.306)}

“左”的东西也有。我们党具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其中一条是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左”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在纠正一种倾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止另一种倾向。长期的实践证明这是非常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着力纠正“左”的倾向。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有些人借“解放思想”之名，使右的倾向抬头，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泛滥的情况。而当我党制定并坚持不懈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左”的倾向又有“回潮”，主要表现在：

1. “姓社姓资”的争论。对于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证券、股票、市场等问题，有些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仍然是从观念、从“本本”、从原有的经验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例如，片面理解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纯粹的公有制，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就是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归入资本主义的范畴；教条主义地理解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把实行对外开放，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和管理，视为引进资本主义。按照这些观点，社会主义只能固守过去的模式。这种僵化的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也在实际上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2. 否定改革开放。有的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进来的不是“苍蝇”而是“猛虎”，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1988年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和失衡现象，有人就说这是由于放松集中计划体制的结果，主张恢复传统的计划体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尽管被党和人民顶住了，有些人却夸大和平演变的现实危险性，甚至企图用过去那种“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框来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3. 忽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P.63)}可是有些人离开了生产力来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制度、政

策、措施、办法，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来反对，把许多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政策、措施、办法，当成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坚持，把改革传统体制和传统做法，当成背离社会主义，尤其表现在反对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4. 歪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标志着我们党对我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防止和避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可是有些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教条化，戴着“左”的有色眼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过分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职能而忽视它的民主职能，甚至把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统统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来反对，直接影响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

由此可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受到“左”和右两方面的挑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斩钉截铁地声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它既排除了右的错误倾向的干扰，也是“意在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挑战，向阻碍改革开放的‘左’倾思潮挑战，向试图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错误主张挑战”。^{[4](P. 659)}

三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论述是何等的精辟！那么我们为什么把“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理解成为既反右而主要是反“左”的宣言书？

1. 这是历史的回顾，比照第一个宣言书的评价。众所周知，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继续推行“左”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难于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与胆识，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邓小平特别强调“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5](P. 133)}“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5](P. 133)}“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5](P. 133)}比较上述谈话与南方讲话的内容，在反“左”倾向上两者的精神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2. 这是思想的武器，革命和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在源远流长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多次出现过“左”或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对工人运动中的“左”右倾错误展开批判和斗争，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得以顺利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以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成立后，面临着右倾机会主义危险和“左”倾无政府主义思潮。“左”倾无政府主义思潮是一些缺乏斗争经验和确信马克思主义而又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年轻幼稚的共产党人中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列宁称之为“左派幼稚病”并深刻指出：“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当然，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

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着手医治。”^{[6](P.256)} 因此，1920年4月，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中列宁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条件，阐明了阶级、政党、领袖、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列宁的论述对于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不愧是反对“左”右倾错误倾向的典范。

3. 这是经验的总结，解放思想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中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5](P.334)} “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5](P.334)} 他的这些论述是对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反对错误倾向的科学总结，也是正确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指导方针。联系我党的历史，“左”或右的机会主义错误，都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先后三次出现了“左”倾错误，尤其是统治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几乎断送了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使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新中国建立以后，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长期性、全局性灾难的，还是“左”的倾向。邓小平正是在总结了国际风云变幻的教训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基础上，提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1](P.228)} 他在南方谈话中用了相当篇幅讲这个问题，有针对性地、感情深沉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能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P.375)}

4. 这是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我们党反对错误倾向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1981年3月，邓小平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的讲话中说：“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5](P.334)}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倾向就纠正什么倾向。过去，由于思想上的绝对化，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再地反右却使“左”的错误倾向不断发展，以致占了支配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主要是纠正“左”的错误。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右的倾向，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1](P.38)} 而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取得胜利后，“左”的思潮又有“回潮”，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在珠海考察时尖锐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停滞，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同紧迫感对立起来。^{[4](P.664)} 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十分具体而又深刻地阐明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

四

综上所述，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紧要关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阐述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也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以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中央作出了重要指示，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多次发表重要谈话，就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行了部署。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讲了40多处“加快”，要求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努力发展自己，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比如，加快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龙头”；批准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发洋浦经济开发区；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作为边境地区新开放的城市，大力发展境外贸易；批准内蒙古、新疆、云南、广西的一些城市和口岸实行对外开放等；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领域进一步扩大，全方位、大开放格局初步形成。各地区、各部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使我国在90年代再上一个新台阶成为现实。雄辩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具有极其巨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在那一系列极其精辟的论断中，加快发展是主题，“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是强调的重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南方讲话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 .
[2] 林孟熏.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M]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
[3] 韩泰华主编.探索与代价（1956—1966）[C]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4] 韩泰华主编.从一大到十五大（下）[C]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
[5]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C] .
[6] 列宁选集（第四卷）[C]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0 .

A Mainly Anti_Leftist Declaration– Deng Xiaoping’ s Talks in South China

CHEN De_hua

Abstract: Deng Xiaoping’ s talk in south China, an anti_rightist as well as mainly anti_leftist declaration, ar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struggle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s and ide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of that time, and a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alks in south China; anti_leftist

(责任编辑: 王本余)